

The Studies on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hina

中国西部发展研究

中国东西部 人口发展比较研究

罗淳 吕昭河 等著

The Comparative
Study on Population
Development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hina

Luo Chun
Lü Zhaohe et al.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The Studies on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hina

中国西部发展研究

中国东西部 人口发展比较研究

罗淳 吕昭河 等著

The Comparative
Study on Population
Development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hina

Luo Chun
Lü Zhaohe et al.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东西部人口发展比较研究 / 罗淳, 吕昭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4

ISBN 978 - 7 - 5004 - 6148 - 7

I. 中… II. ①罗… ②吕… III. 人口 - 发展 - 对比研究 - 中国 IV. C9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2380 号

出版策划 任明
责任编辑 孔继萍
责任校对 石春梅
封面设计 杨蕾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址 <http://www.csspw.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订 鑫鑫装订厂

版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12.625

插页 2

字数 339 千字

定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主 编：

汪 戎 教授 经济史博士 博士生导师

杨先明 教授 经济学博士 博士生导师

吕昭河 教授 经济学博士 博士生导师

何 明 教授 史学博士 博士生导师

作者简介：

罗淳 男，1956年出生于昆明市，西南财经大学博士，云南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人口理论的教学与研究。

吕昭河 男，云南人，1956年生，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云南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人口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

中国西部发展研究

- ◇中国西部经济周期研究
- ◇中国西部国际直接投资吸引力研究
- ◇能力结构与东西部区域经济合作
- ◇高新技术产业与西部经济增长
- ◇中国东西部人口发展比较研究
- ◇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云南案例
- ◇人类行为与湖泊生命
- ◇转型期中国人力资本问题研究
- ◇基于人力资源的西部开发研究
-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与西部外向
型经济发展研究——云南案例

出版策划：任明

封面设计：杨蕾

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失衡、预警机制与社会稳定研究》(项目批准号:05&ZD04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书获得云南社会科学出版基金赞助

引 言

在中国社会快速转型，区域非均衡发展日趋显性化，人口发展凸显出区域发展差异的条件下，引发对区域人口比较的研究需求思考。

对本题的研究兴趣实际上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进入人口研究领域就产生了。出于对胡焕庸提出的“爱辉—腾冲”人口分布线所表达的东西人口分布观点的由衷欣赏，产生了最初的深究东西人口发展差异性的兴趣。这种研究兴趣虽然一直没有中断，但是对这一研究的目标总是没有真切地得到把握，主要原因之一，是过去的人口研究领域和对我国现实人口政策的理解主要局限于一个较为狭窄的范围。例如，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控制目标要么服从“全国一盘棋”的整体需要，要么以省（实际为省市区）为行政单位推行人口发展政策。在以计划生育为人口发展的主导因素的条件下，人口发展的差异性实际主要体现为省市区人口政策推行的效率差异，没有表现为强烈的跨区域的東西人口发展的显著差异，或者这种已经存在的人口发展的区域差异性没有成为理解社会发展区域差别的重要因素，因此并未引起学术研究的关注。

当东西部社会发展差异成为全社会关注的对象，且东西部的社会差异演化已经扩展到多个领域，其政策意义凸显之时，东西部人口发展的比较研究的意义就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政策意义极强的研究课题。一方面，不同区域的政府在主导社会发展（其中人口发展是其重要内容）所拥有的公共资源凸显出区域性差异，并引导出泾渭分明的区域社会发展态势，这种情形已经被概念化为“东西部差异发展”。就人口现象而言，这种仍然继续演化的

“东西部非均衡发展”态势是一个新的人口发展过程，它明显超越了人口发展较为单纯地由人口政策推动和主导，在高度“一统”的国家人口政策框架中实现的单纯性人口政策主导阶段。就目前人口发展的态势而言，人口发展的内容越来越被归入一个广泛的社会领域，高度“一统”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并不能完全影响其发展走向和解释其形成机理。在人口政策和人口控制的行政效率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人口发展的主导因素，政府主导整体社会发展的资源动员能力和效率，成为更为重要的人口发展动力资源，即综合性社会发展政策和战略主导阶段。另一方面，市场的演化与成熟的程度成为更具导向性的人口发展的动力资源。人口发展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上越来越不能只在一个单纯性的人口政策和行政制约的环境中认识，也不是一个仅仅可以由政府资源左右的发展过程，而是一个越来越显现“自发形成”的市场推动过程，是一个在不同的价值取向下进行理性选择的过程，即市场主导阶段。

因此，东西部人口发展差异性的成因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由单纯性的人口政策推动因素转变为以“综合社会发展”为目标的政府推动与“自发生成”的市场推动共同作用下的“双重推动”因素。政府在推动整体社会发展的资源能力与市场体制的成熟程度两个方面，越来越演化为显性的东西部区域差异。由此可以推断，东西部人口发展差异性将会是一个持续演化的态势。在这一情形下，我们需要从新的观察角度来分析东西部人口发展的差异性，解析东西部人口发展差异性形成的机理和寻求缩小这一差异性的政策选择。

对本题的这种考虑实际上表达了对我国人口发展历史过程的连续性的肯定。东西部人口发展的差异性广泛地表达了人口受制于自然地理、环境因素、文化传统、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而这一切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就已经形成东西部的巨大差异性，也必然演化成为相互之间人口发展差异的必然归属。在“一统”性人口政策因素对人口发展的作用效率和作用范围渐行弱化的过程中，人口发展区域差异的内在因素的作用将显化和强化，也为我们理解东西部人

口发展差异性的成因提供具有历史连续性的思维模式。

东西部在历史演化与现实发展的过程中已经显现出各自在内部结构上的均质性和相互比较之异质性，具有典型的区域经济和社会结构样式，而人口模式是其差异性结构特性的重要内容。

基于这种思考，本研究主旨为研究区域人口发展的差异，差异形成的原因以及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等问题。区域经济学（regional economics）把区域视为一个有机的、动态变化的地域整体。而且在区域类型的划分上可以分为按照物质内涵划分的自然区域和社会经济区域，或者按照内在结构划分的均质区和枢纽区。^① 本研究具有自然区域与社会经济区域相统一的特征，而且在各自的内部特征上具有均质性，即东西两个部分是我国三大经济地带的重要部分，与我国中部相比，社会经济区域特性都格外的显著。^② 两者之间在人类活动形态的典型性差异主要体现在：东部为沿海地区，西部为内陆腹地；东部主要为汉族聚居区，西部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从东西部的结构特性来说，东部是重要的，影响全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结节区，如我国首都、历史文化名城北京，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商贸金融中心和重要的国际港口城市上海，我国南方重要的对外贸易及出入境口岸广州，以及经济特区，长江和珠江三角洲经济带等等，都分布在我国东部，其人口、物质、信息聚集所形成的辐射和服务半径很广，是西部远远不可企及的，并存在着经济与社会结构和功能上的严重缺失；与东部比较，西部很少有发育成熟的、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经济结节区，而且在西部区域内部，由于自然区域的地理分割性很强，经济融合性较差，因而导

^① 区域经济学研究者认为：“区域经济学要研究解决的是一个有意义的地区，不是任意划定的一块地区。”参见吴殿廷主编：《区域经济学》，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② 有研究者认为，东部和中西部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在继续扩大，特别认为中国中部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结构矛盾，以及有效需求不足、三农问题、城市化滞后等问题的集中区域，中部经济呈现缓慢的“塌陷”趋势。参见王小广：《我国应实施“中部振兴”新战略》，《新华文摘》2004年第17期，第41—42页。

致结节区之间难以形成互动关联，各结节区的人口、物质、信息聚集所形成的辐射和服务半径非常有限。在一定程度上，东西部存在着经济与社会结构和功能上的非可比性。

西部地区所包括的12个省市区被整体地包容在国家推行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中，深刻地表明我国西部地区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特性上是均质的，特别是与东部比较，西部人口发展总体特征和内部结构，具有多个方面，甚至全方位地体现出欠发展的均质性。而两者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征又强烈地体现出其各自的特性即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正是我们所预设的分析依据和内容。

东西部社会发展的差异性是多方面的。正因为如此，人口发展的区域差异比较成为一个研究者经常关注的问题。就研究而言，中国东西部人口发展比较并不是一个研究的空白领域，甚至也不是一个新颖的话题。在不同场合或在一些研究中，人们常不经意地提示西部人口发展的落后性。较之于东部，西部人口在发展程度上的确体现出总体上的滞后性，也即结构的传统性。但是，人口发展比较的差异性体现，除了定义为发展的阶段特征外，我们不期望简单地用“落后”与“先进”，或者“现代”与“传统”进行价值判断、概念分类和差异分析。东西部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自然和文化环境基础的差异，发展机遇异同等等因素，必然导致两者间的历史人口轨迹、现实人口发展道路选择以及今后人口发展与变化趋势的区域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已经成为各自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决定因素”和重要标识，也将进一步在各自的未来发展中作为重要的“历史决定因素”，影响各自的社会发展。^①

^①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说道：“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我们从人口是“历史中的决定因素”的基本观点和立论出发，来认识西部人口发展的意义，也是我们比较东西部人口发展差异，分析这种差异形成的原因和不同人口发展模式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作用的主要研究意图。

西部大开发战略提供了解析西部人口—经济互动关系，系统思考新的历史机遇条件下人口发展的政策意义和实践价值的空间。

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主导下的西部发展，为本研究提供了从宏观战略构架、历史机遇、社会深层因素等方面认识西部人口问题的大背景，也为把西部人口发展战略有机融入西部发展过程，形成西部人口—经济良性循环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实现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平衡发展需要在以人为本理念指导下实现人口—经济协调发展，或者说西部发展必须依赖人口—经济良性系统的强有力支撑。

落后地区开发是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很多存在着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国家的治国方略。利用国家力量引入外部资源推动落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是主要途径，其理论依据是落后地区内生性增长动力缺乏，很难依赖自身因素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在现代人口增长背景下，由“低投资—低效率—低收入—低投资”贫困陷阱突出显示出其受制于人口—经济之间的一种恶性循环。因此，人口因素常常被赋予双重意义：作为贫困后果，人口的系统特征相应表现出低度发展状况，欠发达社会环境构架了人口结构演化的滞后性；人口传统性质和增长机制，又较大程度地将衍生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人口压力，引发和加重经济问题，导致更为深层、更为长久的贫困状况。从这两个角度理解，人口因素都是区域发展战略中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解脱“人口陷阱”，实现人口—经济的良性循环，最大限度地把人口压力转化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推动因素，更成为欠发达区域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人口—经济之间的系统关联性，可以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得到充分的证实。事实上，无论发达与欠发达，人口与经济都必然处于一个密切相关的系统中，在一种因果互动、交互影响的系统中形成特定的人口经济模式，或者推动或者限制社会的发展。

根据上述思路，我们进行东西部人口发展比较研究依据主要在于：第一，中国东西部发展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性，而且这既是中国长时期的历史存在，又是现今与今后我国仍然将长期面对的重大发展问题；

第二,旨在推动西部发展,实现区域平衡的西部开发战略,是一项社会综合发展规划,人口是其中至关重大的战略决策;第三,局限于西部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与东部相比,西部的人口发展状况、特性,以及形成环境和制约的因素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会对现实的和未来的西部发展决策产生重要影响,而且还可能影响发展目标的实现。上述三个方面引导我们研究和思考东西部人口发展的差异性,探索与寻求加快西部人口发展,并进而推动西部社会发展的理论思考。

本研究寻求人口发展的一般理论和历史经验在我国东西部案例中的具体表达,在东西部人口发展区域差异的比较分析中进行理论阐释和提供印证素材。

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联性特征非常明显。按照人口转变理论,社会经济发展是人口再生产模式实现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转变的主要推动因素,或者说,现代社会以来发生的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口革命(包括“死亡率革命”和“出生率革命”)是由“工业革命”所推动的。在全世界范围,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以及所达到的发展水平出现了巨大的差异性,使得与之相对应的人口转变的演进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人口现象体现出纷繁复杂的表现特征。我们从人均GDP与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和总和生育率三个指标的关联性可以得到上述理论观点的证实。

第一,“死亡率革命”首先发生在西欧国家的工业革命时期。基于社会物质财富增长提供的国民在营养、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历史进步,导致了死亡率率先持续下降。虽然在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依赖于自身的人口死亡率控制因素的转变实现的内生性死亡率下降,与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主要依赖外生因素(如外部输入的现代医疗技术特别是对急性传染病的控制技术,以及预防保健技术等)实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人口死亡率的持续下降。但是,作为一个持续发生的过程,经济因素的作用是最根本的。通过较长时期的经验数据的检验,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人均GDP与婴儿死亡

率下降可能达到的水平具有非常显著的相关性。图 1 中，我们选取了 2000 年世界 166 个国家或地区^①的人均 GDP^②与婴儿死亡率（参见图 1^③）、出生预期寿命（参见图 2）分别列出其线性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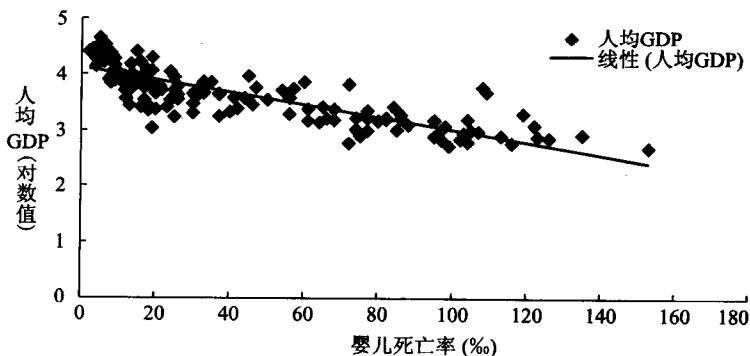


图 1 人均 GDP 与婴儿死亡率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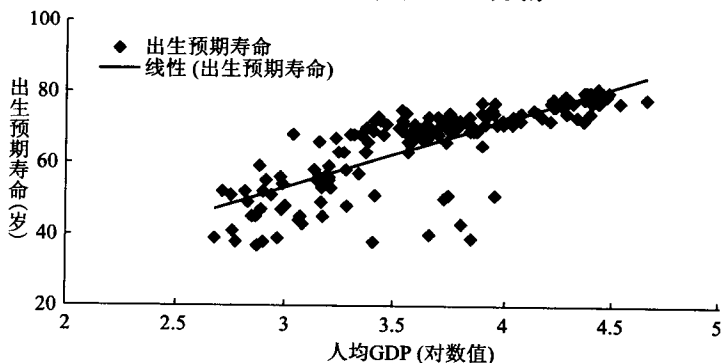


图 2 出生预期寿命与人均 GDP 关系

① 资料来源：[美] 美国人口咨询局（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World Population Data Sheet [J]（2002 年世界人口数据表），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编译，《人口文摘》（增刊），（2002）京新出报刊增准字第 429 号。

② 此处所引的人均 GDP 为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的各国人均国民收入，即 PPP。

③ 图 1、图 2、图 3 的人均 GDP 均为对数取值。

从图 1 的趋势线可以判断,人均 GDP 与婴儿死亡率存在着负向的线性关系,即人均 GDP 高的国家或地区,其婴儿死亡率水平低,反之则高。按发达程度分类,较发达地区人均 GDP 为 22060 美元,婴儿死亡率平均水平为 7‰,不发达地区人均 GDP 为 3580 美元,婴儿死亡率平均水平为 60‰,而不发达地区(除中国)人均 GDP 为 3470 美元,婴儿死亡率平均水平为 64‰。较发达地区的人均 GDP 是不发达地区人均 GDP 的 6.2 倍,而不发达地区的婴儿死亡率是较发达地区的婴儿死亡率的 8.6 倍。婴儿死亡率与经济发达水平之间的负向关联性在世界范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从比较分析角度出发,高婴儿死亡率与低婴儿死亡率之间的差别,突出表达了相互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的距离。这也是我们以东西部人口发展比较分析推演与社会经济的因果联系,揭示欠发达经济下的人口经济运行关系的理论和实证依据。

与婴儿死亡率和人均 GDP 的密切关联性一样,反映人口生命质量的平均预期寿命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也密切相关。图 2 数据表明,人口出生预期寿命的长短依赖于经济发展提供的人均财富水平的高低。较发达地区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 76 岁,比不发达地区多 11 岁。死亡率制约因素的价值导向是“崇尚长寿”,因此人类会最大程度地利用积累起来的物质财富和技术手段实现长寿的目标。因此,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会在人类生命质量(突出体现为预期寿命的提高)上发挥最大效用。现代社会无论个人行为还是国家宏观政策,在这一价值目标下的效率都是很高的。“崇尚长寿”的价值观使发达国家最大限度地利用现代社会的发展成就,追求生命质量和长寿,也使一些较低发展程度的国家实现了超过其经济发展的预期寿命增长。例如,2000 年中国以 3920 美元的人均 GDP 实现了 71 岁的出生预期寿命,寿命与经济的关系即体现为价值观对行为的强烈导向性,同时也需要社会物质成果和技术手段的支持。中国人口预期寿命提高,与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生命保障系统与体制的效率相关。

与具有历史一贯性和普遍意义的“长寿崇尚”价值观不同，生育观念的历史沉淀显然沉重得多，需要足够的转变过程和社会财富的积累。但是，现代社会的发展必然导致多育观念发生历史性的转变。图3显示人均GDP与总和生育率之间存在着随着人均GDP的增长，人类生育行为的价值取向由多生育转变为少生育，生育率呈现持续下降趋势。2000年，较发达地区总和生育率为1.6，较大幅度低于更替水平；不发达地区的总和生育率为3.1，几乎是前者的两倍，而且剔除中国后不发达地区总和生育率水平提高为3.5。显然，是发展中国家把世界生育水平维持在高位。图3显示的各国总和生育率与人均GDP的点状分布，存在着很多远离趋势线的散点，提示人类的生育行为的制约机制较为复杂，单因素不能全部解释生育率变化的全部动向。但是，理论与经验都证实，孩子成本效用关系受人均收入水平的影响，生育率变化的基本趋势服从于经济发展取向和获得的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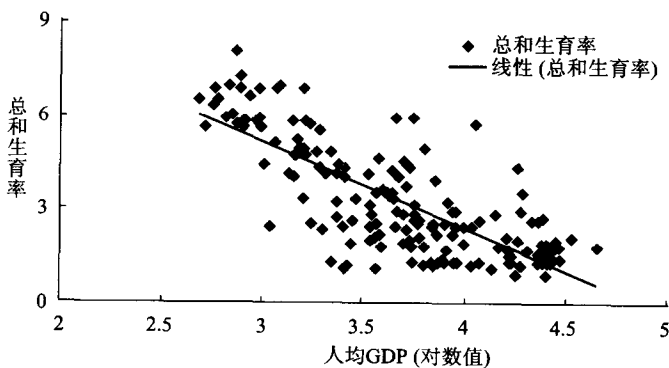


图3 总和生育率与人均GDP关系

上述分析提示我们：人口状况最终总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逻辑结果。同时，社会经济发展的每一进程都必然与相应的人口转变为重要内容，以某种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内生人口因素的形成条件。特别是在区域经济发展上，人口—经济运行的内生机制的形成具有关

键意义。罗纳德·J. 克鲁姆和乔治·S. 托利认为，“区域经济学的主要问题：是解释在一国国民经济范围内生产和人口分布状况……”^①地区的商品需求决定于地区人口的内生数量，以及劳动力作为区域间流动的生产要素，对区域生产发展产生影响。

因此，基于西部区域发展背景，以东部人口发展为参照，研究西部区域人口发展的问题，是我们研究的主旨。我们期待的研究结论既可能在比较研究中获得对一般人口发展理论的印证，但是也充分考虑到由于区域人口是一个影响因素非常复杂的系统，对这一复杂系统的分析必然存在着遗漏，我们试图在主要因素的分析 and 常规性的研究设置中提供研究结论。

^① 参见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特·纽曼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4卷，“区域经济学”条目，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128页。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我国东西部人口发展的历史与条件分析	(1)
第二章 东西部人口地理特征比较分析	(31)
第一节 人口地理特征的比较分析	(31)
第二节 东西部人口地理特征的自然因素分析	(46)
第三节 自然环境对人口地理分布和经济社会发展 的影响	(56)
第三章 东西部人口性别与年龄结构比较分析	(70)
第一节 东西部人口性别结构比较	(70)
第二节 东西部人口年龄结构比较	(80)
第三节 东西部人口性别与年龄结构差异的主要 成因	(87)
第四章 东西部人口再生产与人口转变比较分析	(94)
第一节 人口再生产与人口转变的西方理论与中国 实践	(94)
第二节 东西部人口再生产与人口转变的指标解析 与框架构建	(102)
第三节 东西部人口再生产的转变阶段与类型划分	(121)
第四节 影响东西部人口再生产与人口转变的因素	